

心系我们的英雄

九旬老兵的无悔青春

■韩欣妍 李师琪 杨晶

公园里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遇了。其中一位老人激动地上前抓起另一位老人的手，不敢相信地说：“彭家英啊？啊呀，你是彭家英老人！”她转头高兴地对身旁人说：“她是我们的班长！”被叫作班长的彭家英老人，用大拇指自豪地指向自己说：“我是班长！”两位老兵激动相拥，眼睛里绽出泪花。

……

这是去年10月一条悄然走红网络的短视频中的一幕。

第十八军进藏老兵闫家琪在公园散步时，意外和老班长彭家英相遇。时隔74年后相见，她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，互相敬礼。循着线索，我们来到成都第十四离职干部休养所，采访了包括彭家英在内的5位平均年龄96岁的“老西藏”；又几经辗转，见到了95岁高龄的闫家琪。

据彭家英的女儿李林阳介绍，近年来彭家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，记忆经常出现混乱，但是一提起进藏往事，她的眼神立即就闪烁出不一样的光彩。交谈中，我们得知李林阳在西藏林芝出生，“林阳”取自“林芝的阳光”。这个名字蕴含着一名战士、一位母亲刻骨铭心的爱与记忆。

1950年3月，第十八军踏上进军西藏的征程。在进藏大军中，彭家英、闫家琪等文工队女兵们，同样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

进军西藏的路上，她们要翻越的第一座山就是二郎山。“二郎山没有路，我们创造了一条路……”提起二郎山，彭家英开始情不自禁地打着节拍唱：“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么高万丈，古树荒草遍野，巨石满山岗……”采访中，彭家英数次唱起《歌唱二郎山》，每每唱起这首歌，当年的飒爽英姿重现。书架上放着彭家英年轻时的照片，上面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，逐渐与眼前的人重叠，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，仿佛回到当年。

翻过二郎山，就是甘孜。为解决空投物资问题，彭家英带领一个女兵班投入甘孜机场建设。比起拿牛皮筐装土、用手镐和铁锹挖地，彭家英印象深刻的是她们住的窑洞。“那个地方怪得很，白天下雨，夜里才是晴天。窑洞上面盖着土渣和树皮，一层一层的，下雨会变得很重。”风雨无情，一天夜里，窑洞被蓄积的雨水压塌了，彭家英的4位战友永远留在了那里。

艰难困苦并没有阻止她们前进的脚步。面对寒冷刺骨的冰河，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要光脚蹚过去。班长彭家英经常能听到战友们的“悄悄话”：“嘘，不要跟班长说我来了例假……”每每提起那些战友，彭家英都忍不住感慨：“我这个班长好当得很呐，她们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。”

这群从不叫苦的女兵，年龄都在20岁左右，来自北京、成都、西安、郑州、南京等地。闫家琪是其中一员。

“我一见到她，好亲切啊！”提起彭家英，闫家琪情难自抑，眼里闪着泪光。74年的光阴模糊了记忆里的面容，却没有模糊彭家英教她如何打背包、怎样系绑腿、怎样当一名合格战士的回忆。

采访时，闫家琪拉着我们的手，细数老照片里蕴藏的故事。“翻一座雪山时，我们喘不过气，嘴唇乌青，脸涨得通红。男同志都来抢着背我们的背包，但是没有一个是背被‘抢走’的。我们知道，再苦再累，也不能停下。”

曾在林芝工作24年的闫家琪，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片桃花林。“我们的帐篷就搭在桃花树枝下，好浪漫啊。”闫家琪笑呵呵地说着。然而我们知道，那时条件十分艰苦，她在简陋的帐篷里一住就是8年。

“我是西藏人！”

这是路晨脱口而出的话。谈起跟随部队进军西藏的经历，这位97

岁的老兵有太多的感慨：“当时修路，是修得真急，急到什么程度呢？爆破的炸药一炸响，战士们就住碎石堆里冲……”

“看到西藏人民受苦，不解放他们，没有良心！”路晨回忆说，进军西藏途中，他们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不进寺庙、不动经幡，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“金珠玛米”。

提及这个称呼，老兵牛文海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“金珠玛米亚古都（藏语，意为解放军好）！”这句藏语里蕴含着这位老兵大半生的骄傲。

进军西藏、建设西藏，第十八军官兵视驻地故乡，把藏族同胞当亲人，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，书写下“让高山低头、让河水让路”的豪迈篇章，锤炼形成了“老西藏精神”。在官兵们的共同努力下，雪域高原的面貌焕然一新，第一条公路、第一个农场、第一所学校……众多的“第一”背后，镌刻着老兵们无悔的青春。

三

老兵们有着相似的爱好的。闫秉章喜欢收藏纪念茶缸，“长期建藏，边疆为家”，茶缸上的8个大字几乎概括了他的一生。闫秉章在西藏工作38年，待到再见家乡姊妹时，已是垂垂老者。路晨喜欢珍藏老照片，那些泛黄的影像里记录着他的军旅生涯与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我们面前，他给自己“画像”：“97岁的老头，82年的老兵，81年的老党员，40年的‘老西藏’。”越说，语气越是自豪。

牛皮纸裹着锡纸，锡纸上包着纪念章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刘广润的“宝箱”，映入眼帘的27枚纪念章里，有10枚与西藏和平解放有关。每张布满折痕的牛皮纸上，都工整地写着与纪念章有关的事件、时间和地点。纪念章熠熠生辉，从中我们看见了一位老兵的荣光。

他们用双脚踏出的，何止是通往世界屋脊的天路，他们筑起的更是一

座让后世仰望的精神丰碑。那些难以言喻的困难和艰辛，如今在老兵们的讲述中变得云淡风轻。

“白天雨布盖在身上，冬天搭个‘人’字帐篷。帐篷就搭到桃花树下，好浪漫哟。”

“向荒野进军、向土地要粮、向沙滩要菜，我们八一农场的洋芋，特号帽子装不下！”

“别看我们那时候苦，都没有愁眉苦脸的样子。”

四

彭家英、闫家琪、路晨、牛文海、闫秉章、刘广润，这群平均年龄96岁的老兵大多已步履蹒跚。然而，他们关于西藏的记忆与情感，依旧鲜活、热烈，说起进军西藏的经历，他们的眼神一个比一个明亮。进军西藏路上的点点滴滴，唱过的一首首豪迈歌曲，已融进他们的血肉、镌刻在他们的心中。

分别的时候，手挥了一遍又一遍，“快回去吧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回，他们依然踉跄地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。彭家英老人久久地握住我们的手不肯松。她动情地说：“我们马上就要带着故事走了，再不讲就来不及了……”

瞬间，笔者的鼻尖酸涩，心绪久久难平，泛起的泪光模糊了老兵的身影。他们的年龄逐渐老去，但他们的精神永远青春！



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相关采访内容

井冈杜鹃红

■张帆

红色足迹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巍巍井冈山，血色杜鹃年年绽放如燃烧的火焰。在青松掩映处，石碑上镌刻着一位革命先辈的名字——曾志。这位15岁投身革命、历经血与火淬炼的红军战士，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赤诚。

1926年，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剪去长发，取意“要为女性争志气”，改名为“曾志”，投身革命洪流。从湖南暴动到井冈山上的革命斗争，从闽西苏区到延安，她跟随革命的队伍前行，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。

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右侧的一座山坡上，我看到了曾志墓。那是一座极其简朴的墓碑，青石上刻着“魂归井冈山——红军老战士曾志”11个字。

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。曾志跟随朱德、陈毅部队转战湘南，在耒阳组建工农自卫军。次年，她亲历湘南暴动，带领妇女队为部队运送弹药。当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时，这个年轻姑娘背着沉重的文件箱，在崎岖山路上连续行军，双脚被磨得血肉模糊仍坚定前行。在井冈山，曾志参加了“黄洋界保卫战”；为动

员群众、宣传革命，她用石灰水在土墙上书写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标语。

1929年，曾志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。在闽西特委工作期间，她凭借着机智勇敢，临危不惧，躲避敌人的盯梢、追捕，多次出色完成任务。1934年初，曾志还曾亲赴西洋岛谈判，收编柯成贵的队伍为“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”。

曾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她，在去世前留下遗嘱，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全部捐献给邵阳和宜章两县的“希望工程”。她说：“共产党人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，除了信仰之外，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，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。”

曾志在一份名为《生命熄灭的交代》的遗书中写道：“遗体送医院解剖，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火化；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当肥料……”

暮春时节，再上井冈山。烈士陵园的石阶被细雨洗得发亮。望着漫山遍野的杜鹃，面对曾志的墓碑，我渐渐明白：真正的丰碑并不是用花岗岩石砌成的，而是如种在人心里的火种，总会释放出热量与光明。

血色杜鹃绽放在晨曦中，红色花瓣上凝着水珠，恰似革命先辈在革命道路上挥洒的血与汗。山风过处，松涛阵阵，仿佛在诉说血火岁月中的井冈传奇——在这里，一位共产党员、红军战士的信仰之花正灿烂绽放。

遥远的思念

■李引贵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清明时节，对父母和故乡的思念如细雨般飘洒心间。我打开卫星地图，移动鼠标，地图比例尺迅速变化。在电脑屏幕上，我看到了家乡：巍巍太行，近在咫尺；蜿蜒汾河，尽收眼底。故乡的山山水水，依旧如诗如画，如此锦绣。

我继续操纵鼠标，迎面出现一个小村庄。尽管小村偏僻，没有全景画面，但“黄花岭村”4个大字，早已镌刻在我的心中。多少载，我对它魂牵梦萦。

村后一条羊肠小道，通往山岭最高处。山湾环抱处，是我父母的坟冢……母亲善良贤德。她得重病时对家人说：“我死前一定要给他爹缝织好后半辈子穿的衣服。”那时，她强忍病痛为父亲缝了春夏秋冬十几套衣服。最后一套，是她给自己缝的寿服。缝好不久，母亲就去世了。

养老送终本是为子女的分内事，而我当时正带领连队在外执行任务。为了不让我分心，母亲让家人对我“封锁”了她病重的消息。最终，她悄悄地走了，临终留下一句话：“我去后也别告诉娃，家里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，部队上的事情可不能耽误！”

父亲后来告诉我，那些日子，母亲常倚在门口往远处看，后来站不起来

了，就在炕上趴在窗口往外瞅，仿佛在盼望着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。就这样，母亲走了。临走时，她还念着我的名字……

革命战争年代，父亲的胸骨在战斗中受过重伤。有一年，我回家探亲，才发现父亲几乎已经无法行走。原来是旧伤复发，他却对我报喜不报忧。母亲已走，亏欠无法弥补，不能再让父亲受苦！我立即将父亲送到北京的医院治疗。然而，没想到的是，手术失败，父亲再也走不了路。

父亲有老前辈军人的铮铮铁骨，为人豁达大度。去世前，他留给我一封遗书，字句间饱含大义与深情——

“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军人要担当，家属要承受！当年你爷爷去世时，你母亲守口如瓶，内外独自担当，就怕我在前线作战分心和担忧。你母亲深明大义在前头，当年我是军人，如今我是军属，我的病情危重反复……你要原谅父亲的不辞而别。”

还有，记得在我死后埋葬时，把你母亲给我做的那些衣服，放进棺木让我带着走……”

手捧遗书，我失声痛哭。父亲母亲对我的影响，是深刻的，是永恒的。他们用默默无言的奉献，教导我走好军旅路。凝望着地图上那个名为“黄花岭村”的光点，思念如潮水漫过我的心头，渐渐也模糊了双眼……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说到军车，不少人会想到北京吉普。这个越野车中的“硬汉子”，曾在军事交通史上留下一行行传奇辙印，高原军人对它更有着特殊情感。

我入伍于20世纪80年代，那时高原部队使用的小车就是北京吉普（212型）。当时我们团只有两辆，是机关公务用车。团首长将其视为宝贝疙瘩，非重要公务不肯轻易动车。驾驶员每天把车擦得锃亮，驾驶时更是生怕碰掉一点漆。

吉普车总是吸引着大家的眼光。看到吉普车驶进营连，战士们都会行注目礼。外出时，遇见吉普车奔驰在高原公路上，扬起一路烟尘，酷似骏马驰骋在疆场，官兵通常会引颈而望，直到车身消失在天边。

倘若能坐上一回吉普车，那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有一次，我连炊事班班长到县城办事，返回时正好遇到团长乘车从师部开会回来。见他一个人走在公路上，团长就顺道把他捎回连队。下车后，炊事班班长的脸乐得像一朵花，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。

几年后，我成长为一名军事新闻工作者，并调到西藏军区机关工作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我才真正尝到坐吉普车的滋味。

那时的高原公路多是土路，起伏不平，坑坑洼洼，被人们称为“搓板路”。吉普车行驶在路上，怎么也快不起来。

行驶在海拔高的地区，吉普车也会出现“高原反应”，具体表现为排气管冒黑烟，并不时发出“嘟嘟”的响声。遇到爬坡时，车尾简直是浓烟滚滚，排气管里发出的声响震耳欲聋。有时一段上坡没爬完，巨大的声响戛然而止，车熄火了，驾驶员再怎么点火也发动不起来。

车趴窝了，怎么办？这时，不等驾驶员发话，我们坐车的人立即跳下来，把车往前推。待车轮渐渐转动起来跑上几十米后，驾驶员猛一挂挡，发动机又重新响起轰鸣声。吉普车的“高反”过去了，推车人的“高反”上来了，只见个个脸色煞白，张大嘴巴喘息好半天才缓过劲来。

高原行车难，途中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。这就要求驾驶员不仅要熟悉吉普车的脾气，拥有过硬的驾驶技术，还要掌握“望闻问切”技能，随时随地能排除车辆出现的各种高原“疾患”。

有一次，我陪同一家媒体的记者去边防采访。吉普车驶出拉萨时，一路坦途，跑得还算欢实。可翻越一座海拔5600米的大山时，车就抛锚了。驾驶员打开车前盖检查，“油泵发”“高烧”了，得用物理降温法“退烧”。驾驶员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路边取来一桶水淋在油泵上。

吉普车继续上路，然而不到20分钟发动机又熄火了。驾驶员下车检查，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，索性从路边的水沟里挖来一团泥，糊在油泵上，心想这样冷却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孰料，行驶没多久，发动机又罢工了……就这样，走走停停反复10多次，车终于爬上山顶。

从山脚到山顶20多公里山路，吉普车走了4个多小时。同行的记者感慨说：“这趟高原之行，真是令人难忘！”

1996年，上级给我们配发了一台新的吉普车。没想到上高原不到1年时间，它就患上了一身“高原病”：动力变弱、故障频发，遇到“拦路虎”就趴窝。

于是，在出行中常出现这样的画面：上高山时，车爬行吃力，我们就推着车走；过冰雪路时，我们给车轮套上防滑链，并下车陪着它走一程，以防发生意外；蹬冰河时，担心车载过重陷入河中，我们下车挽起裤腿、举着鞋，先走到对岸，等车渡过河再上车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们采访结束后返回拉

难忘高原吉普车

■刘励华

萨，行至米拉山下，吉普车突然熄火。驾驶员多次尝试启动没有成功。“完了，电瓶出问题了！”我们的心一阵冰凉。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该怎么办啊？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这时，我们看见不远处有个公路道班，大家赶紧前往求助。可进道班后才发现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，驾驶员灵机一动，跑到垃圾堆里搜寻起来，不一会儿便找到4节废旧的1号电池。

回到车上，驾驶员将4节电池捆绑在一起，连接上电线，再将电线接到车的电路上。只见驾驶员将点火开关一扭，车被启动了。面对这神奇的一幕，我们连连夸赞驾驶员了不起。

当然，奇路多艰险，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。

那年初冬时节，我们赴千里之外的边防连队采访。吉普车行驶至海拔6100米的山口，就再也跑不动了。驾驶员使出浑身解数，捣鼓了3个多小时，车依然纹丝不动。此时，太阳西沉，气温越来越低，严重缺氧让我们开始感到气短。驾驶员忧心忡忡地说，这里夜间气温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，缺氧也会加剧，如果不下山，会有性命之忧啊！

就在危险向我们渐渐逼近之时，迎面驶来一辆地方运输车，我果断拦下车，向司机说明情况。司机是个热心人，见我们遇到困难，立即调转头，搭上我们的一位同事紧急下山，前往70多公里外的边防团报信。

晚上9点多钟，边防团派来的“救兵”到了。救援官兵见我们冻得快失去知觉，立即从保温壶里倒出姜汤让我们喝下，将棉被捂在我们身上，又把我们扶上车，连夜送到团卫生队。所幸救援及时，无人冻伤。第二天，团里又派一辆大车将我们的吉普车拖到团部。

类似经历，我遇到过好多次。在高原工作10多年，吉普车伴着我山一程、水一程，走向边关哨所；风一更、雪一更，探访座座军营，留下一行行深深辙印。每当采访满载而归时，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有意义。吉普车，不仅是我亲密的战友，更是我军事新闻生涯的“功臣”。

如今，高原的交通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交通工具与出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。然而，我与吉普车结下的情，却永远留在心里，慰藉和温暖着我。



雨中行动(版画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)

颜克疾 谢明月作



长征

第6420期